

考古界有一句老话：“纸千年，绢八百。”纸张类文物，包括古字帖、古籍、古画等，理论最长保存年限不过千年。也正因纸质文物板难留存，更早的纸本书画几乎无真品传世。

但有一幅距今1600多年的东晋古画，不仅保存状态十分完好，画风还格外清奇另类。它描绘的是东晋贵族的日常生活，却凭借夸张随性的线条、天马行空的构图，被不少专家调侃：“像是‘熊孩子涂鸦’，画工真是‘了得’！”

这幅反差感满满的国宝，就是1964年出土于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的《墓主人生活图》（又称《地主庄园图》），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纸本绘画，现珍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墓主人生活图》。

1600年前的灵魂“涂鸦” 见证丝路文明交融

充满魔幻色彩的东晋古画

《墓主人生活图》能够跨越1600余年完整留存，本身就是考古史上的奇迹。阿斯塔那古墓属于典型的魏晋高昌平民士族墓葬，整体保存相对完整，加之吐鲁番气候极度干燥、地下水位深、空气干燥少雨，形成了天然无菌、恒干的埋藏环境，让极易腐朽的古纸得以完整保存，成为画作千年不腐的核心条件。

该画是一幅极度写作的作品，由六张画纸拼凑而成，形式颇似现代人朋友圈的“九宫格”，纵46.2厘米、横105厘米。出土时，画作并非完整一幅，而是由六张大小相近、质地厚实的土黄色桑皮纸拼接而成。纸面干净，墨色留存清晰，仅有少量自然斑驳痕迹，无严重破损。考古队员对残纸画面进行细致清理、除尘、平整、复位，完整复原了六联纸画的原始拼接顺序与完整画面结构。

复原后，许多专家都蒙了：怎么回事？这也画得太不严肃了吧？妥妥的古画界的“泥石流”啊！

如果看惯了古代工笔画的精致细腻、线条工整、造型精准，再看《墓主人生活图》会瞬间感受到满满的“反差感”。这幅画作完全跳出了古代“审美规矩”，画风随性又质朴，带着几分天真可爱的“拙趣”。以至于现在很多人介绍这幅古画时，会说它的作者是墓主人的孙子。但其实，这只是我们根据画风所做的猜测，关于画师究竟是谁，历史上并无记载。

画中人物造型简单粗犷（眼睛一只大一只小、只有四根手指等），比例也不拘小节，人物大小、姿态全靠创作需求安排。落笔更是随性洒脱，只用简约墨线

勾勒轮廓，搭配朴素的赭石淡彩上色。

看似略带“潦草”的画风，没有宫廷古画的精致滤镜和庄重束缚，反而褪去了刻意雕琢的匠气，多了几分鲜活的人间烟火气。这种不刻意、不做作的民间绘画风格，是它区别于绝大多数传世古画，独树一帜的最大特色。

画面中随处可见的中原符号

画面内容主要分为天象神域和世俗生活两部分，两部分相互呼应，直观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古代丧葬文化中“事死如事生”的核心观念，也就是希望逝者死后依然能延续生前的生活境遇。

画面的下半部分重点刻画了墓主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包括庄园起居、宴饮休憩、外出活动等，清晰还原了东晋高昌贵族的生活日常。中心位置，一位头戴高冠、身着袍服、手执团扇的端坐者，显然是画中的主角——墓主人，这是魏晋时期士大夫的典型穿着。

墓主人身旁，一位穿着红裙、双髻高耸、拱手而立的侍女静立。这种发髻正是魏晋时期中原风靡的搔子髻，主要特点是将头发编成环状，再用丝带紧紧束住。传说搔子髻由晋惠帝后贾南风在宫中首创，后来流传到民间。足见当时西域女子深受中原服饰、发饰及妆面文化的影响。

虽然中心画面只有两个人，但是该有的仪仗一应俱全，比如曲盖，就是墓主人身后的曲柄伞盖，还有他前圆立的节（一种符节类仪仗物）、麾（旗帜）等仪仗器具。这表明墓主人在当时可能拥有较高的地位，甚至可能是州一级的

军政首脑。

画作下方左侧，一棵小树与上方的参天大树相连，构成了一处园林场景。一匹装饰华贵的骏马立于其间，马夫身着短衫，手执马鞭，似乎在等待着秋高气爽时节为主人出行做准备。而右下方则描绘了厨房的场景，石臼、磨盘、精致炊具、精美双耳酒坛及鞍形烤炉一应俱全。炉火旺盛，厨娘正忙着烹饪美食。从庄园规模和画面布局能够判断，墓主人是高昌地区拥有土地庄园和依附人口的世家豪强，社会地位较高，生活条件十分优渥。

画面上半部分绘制的是天象场景，完全沿用了中原传统的天文神话体系。画面左侧画有月亮和蟾蜍，右侧是太阳和金乌鸟。而中间的大树下则是凸起的圆窗，两端的树枝分别指向两组北斗七星，象征着不同的季节。我国古代的“二十四节气”正是以北斗七星的斗柄旋转指向来确定，因此这幅画也蕴含着深厚的天文意义。

太阳、金乌、月亮、蟾蜍这些意象并不是西域本土的文化符号，而是源自中原上古神话和汉晋时期的天文学说，寓意天地秩序井然、阴阳调和，表达了人们希望逝者魂归天宇、得到星辰庇佑的美好愿望，也足以证明汉晋时期的中原宇宙观念已经在西域地区广泛传播并被普遍接受。

中原与西域文化迁徙与融合的真实见证

作为国内稀缺的东晋纸本出土画作，《墓主人生活图》的价值不仅限于艺术审美。它不仅填补了魏晋绘画史

的实物空白，也是研究高昌社会结构、见证丝绸之路文明交融的重要史料。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绘画发展的关键转型阶段，但这一时期的纸本、绢本真迹几乎没有留存下来，学界对魏晋民间绘画的风格、技法和创作题材的了解，大多依靠古籍文献和石刻、壁画等间接资料。而这幅完整的东晋纸本画作，直接证明东晋时期纸张已较为广泛地用于绘画创作，改变了此前书画主要依靠帛画、岩壁的创作模式，是魏晋西域丧葬绘画中极具创新意义的作品。

相较于后世隋唐西域壁画的繁复华丽，这幅东晋作品画风质朴、线条简练，看似略显稚拙的笔触，恰恰还原了魏晋简约自然的艺术风气，摒弃了宫廷绘画的精致雕琢，真实性地保留了民间绘画的时代质感。

画面中留存的建筑形制、服饰样式、仆从规制、庄园布局、生活器具等具象资料，是第一手考古图像资料。相较于碎片化的出土器物，完整的场景图像能够更系统性地还原东晋高昌地区的物质生活风貌。

东晋时期中原战乱频繁，而河西走廊与西域局势相对安稳，大批中原士族、官吏与百姓西迁高昌，将中原的丧葬制度、审美风尚与生活方式完整带入西域。作为高昌官民的公共墓葬地，阿斯塔那古墓群的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壁画内容，均以中原汉文化为核心，同时结合西域地域特色完成本土化演变，《墓主人生活图》正是魏晋时期中原人口西迁、文化西传、丝路文明交融最真实、最直观的历史见证。

陈品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发布多项研究成果

考古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工作者一边在田野发掘，一边对出土文物和遗址进行研究阐释。“从文明探源到文明互鉴考古研究所成果发布会暨重点实验室集刊首发式”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中发布了多项研究成果，包括考古报告13部，专著、数据集、科普读物、图录等21部，中英文权威期刊重要论文30余篇。

考古报告的质量与数量是一个国家考古学水平的体现。此次发布会集中推出《新密新砦（Ⅱ）：2002—201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安阳王裕口南地2009年考古发掘报告》《隋唐洛阳城：2001—2010年考古发掘报告》等13部考古报告，覆盖史前、夏商及古代多个历史时期。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王裕口南地进行发掘，揭露面积超过9000平方米，获得丰富的文化遗存。尤其是贞人家族墓地的发现，为研究殷墟时期贞人集团的来源、地位提供了最直接的资料。《安阳王裕口南地2009年考古发掘报告》将这批材料完整公布，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专著《中国考古学十年（2016—2026）》系统梳理10年中国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历程，全面总结学科建设、田

野发掘、理论创新、科技考古、海外考古等领域标志性成果，集中展现中国考古在实证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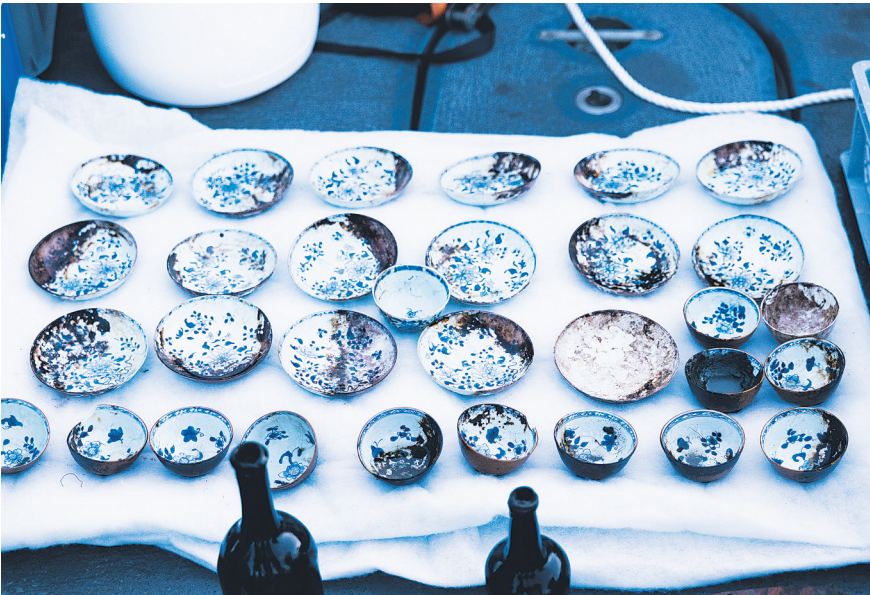
《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92—2018》是之前出版的《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的延续，囊括数据1400个，为多学科研究提供了关键的“时间坐标”。

近1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持续在埃及、洪都拉斯、乌兹别克斯坦、罗马尼亚、巴基斯坦等国家开展联合考古工作，并于今年4月与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联合启动希腊“安杰洛卡斯特洛”考古项目。本次发布的《大道东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赴外考古成果》是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丛书”的第一部，以珍贵图片、翔实资料全景呈现考古研究所开展的中外考古合作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首发了《科技考古集刊》第一集与《文化遗产保护集刊》第一集。两部集刊聚焦科技考古前沿方法、文物保护关键技术、文化遗产传承利用等方向，倡导原创性、前沿性、探索性，为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搭建了新的学术平台。

杨雪梅

挪威海域发现 18 世纪沉船 大量中国瓷器重见天日



从挪威南部的斯卡格拉拉克海峡一艘沉船上打捞的中国瓷器。

新华社电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挪威文化遗产局1日发布新闻稿说，这艘沉船是在挪威南部斯卡格拉拉克海峡水下约600米处发现的，其年代可追溯到18世纪中叶。经初步判断，这批瓷器源自中国，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

除大量瓷器外，考古人员还从沉船中打捞出吊灯、酒杯、纺织品和谷物等货物，以及装有茶叶和中草药的木箱，其中吊灯为德式或英式工艺。

沉船最初由挪威一名钟表设计师发现，此人还经营一家小型水下机器人和勘测公司。目前，挪威有关部门仍在进行勘探调查。其中一批精选文物将于6月在挪威展出。

挪威气候与环境大臣安德烈亚斯·比耶兰·埃里克森表示，这一发现意义非凡，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为研究挪威及北欧的航海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新视角。

挪威文化历史基金会博物馆馆长尼娜·雷夫塞斯说，这“标志着挪威考古学开启了新纪元”。北欧近海发现的沉船大多损毁严重或遭盗窃，而此次发现的沉船“如同封存极其完好的时光胶囊，给我们提供了接触过往的难得机会”。

山西太原阳曲发现一处新石器遗址

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近日公布考古调查发现，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西盘威村新发现一处新石器遗址——西盘威遗址。遗址主体年代为仰韶文化晚期，现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出土大量彩陶，填补了阳曲地区仰韶文化晚期考古研究的空白。

西盘威遗址地处系舟山余脉与太原盆地东北部边缘的过渡地带，地势北高南低，为一处平缓的黄土台地，海拔约959米。遗址东距汾河支流乌河约3公里，西临杨兴河支流，水源充足、土地肥沃，为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经过系统调查，该遗址台地之间的沟内断面上暴露出红烧土、灰坑等遗存，已确认灰坑8处、墓葬1处，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

此次调查出土彩陶数量较多，纹饰简洁而富有规律。彩绘以红褐为主色调，个别使用黑彩，多以菱形、三角、条带等直线型几何线条构成网格、棋格、菱形、平行横带或竖波等单元图案，还见有少量圆圈、逗点纹样。彩影对象以

钵最多，另有盆、罐等，一般绘于口沿内外侧、肩及上腹部。考古人员表示，该遗址陶器与义井遗址陶器特征相类，具有鲜明的仰韶晚期地方风格。

此外，遗址出土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器型包括夹砂绳纹侈沿罐、敛口斜腹钵等，与定襄青石遗址仰韶晚期器物相似。石器以磨制为主，有石环、石铲、石纺轮等，显示出当时较高的制作工艺水平。骨器发现较少，主要有骨锥、骨针。

专家指出，西盘威遗址分布范围广，调查所获遗迹、遗物数量较多，文化内涵极为丰富，不仅填补了阳曲地区仰韶文化晚期考古研究空白，更为探讨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仰韶文化“Y”字形传播路线在太原盆地东北部的具体表现提供了关键实物资料，对构建该区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对认识阳曲地区乃至太原盆地史前文化发展脉络、探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张楠 杨珏

千年辽构承古韵

阁院寺时隔 17 年恢复常态化开放

时隔17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河北涞源县的阁院寺近日正式恢复常态化开放。

学界普遍认为，阁院寺主体建筑文殊殿建造于辽应历十六年（公元966年），是我国现存“八大辽构”中建造年代最早的一座。此前这座千年古刹因修缮未常态化开放。

“在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我们制定了科学规范游览管理方案，让古建筑‘活’起来，‘火’起来。”涞源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郝鑫说，“五一”期间，阁院寺累计接待游客5000余人次，成为涞源文旅一张新名片。

步入寺中，沧桑古韵扑面而来。

阁院寺从南至北依次建有天王殿、文殊殿、藏经楼，其中天王殿、藏经楼为明代建筑，居中的文殊殿显得尤其古朴庄重。殿前两株千年古松，见证了这里的变迁。

今年“五一”期间，当地文旅部门每天安排6场免费讲解，涞源县文物保管所原所长安志敏便是讲解员之一。

“从寺内保存的石碑和清光绪《广昌县志》（涞源旧称广昌）来看，阁院寺在汉代初建，唐代重修。”安志敏对游客们说，这样一座千年古建得以留存实属不易，我们应该保护好，研究好、宣传好。

文殊殿有着中国古建标志性的大屋顶，出檐深远，斗拱雄壮，远看如雄鹰展翅翱翔，恰如《诗经》所云“如鸟斯革，如翬斯飞”。著名建筑历史学家莫宗江曾评价，辽代工匠运用斗拱结构已达到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境界，文殊



▲阁院寺文殊殿的窗棂。

►阁院寺内的飞狐大钟。
受访者/供图

殿便是绝佳范例。

雄浑之外，更藏精巧心思。

殿前常见这样一幕：不少游客不进入殿内，而是站在窗前仔细端详。“这里保留着辽、元、明、清多个朝代的窗棂，简直就是一个‘古代窗棂博物馆’。”北京游客王继宇感慨道，“若不仔细研究分辨，还真不知其中学问这么深。”

安志敏说，古代木结构建筑的门窗易损难存，文殊殿的窗棂历经多次破损、更换，逐渐形成多个朝代窗棂共存的独特格局。

推开殿门，顿生宽敞之感。《涞源县志》记载，文殊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成正形，边长16米。“这么大的建筑，内部竟然只有四根柱子支撑？”游客梁奕

的话，道出不少人的疑问。

安志敏耐心讲解：“文殊殿采用辽代建筑典型的‘减柱造’方式，原本仅有两根立柱，有效改造殿内空间，另外两根柱子是后人为了保护建筑所加。一千多年来，文殊殿从未落架大修，完好保留辽构风貌。经天津大学、北京大学研究团队测定，两根原柱为唐代木料，沿用至今。”

文殊殿东、西、北三面墙壁上有大幅壁画，大部分被黄泥覆盖，仅北墙东侧有一处裸露面积较大，可以看出壁画线条流畅生动，采用了“沥粉贴金”的手法，尽显唐代遗风。

莫宗江在《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一文中记载，原壁画是一幅贯通整个墙壁

新华/传真